

# 台灣新一波移民子女之學校適應與權力複製

莊維貞

## 引言

目前台灣外籍配偶人數(尤其是東南亞籍)逐年增加,父母雙方有一方原非台籍的兒童人數亦已逐年增加,這些外籍配偶多為女性,且多未受過太多正式學校教育,她們的子女到了要進入學校體系受教育時,情況與父母雙方皆為臺籍者之學童,尤其與家長受過較多教育的台籍家庭子女,在語言、習慣、價值觀上會有所差距是可預期的。當某些學童與主流文化有差距時,這些學童在學校的生存適應狀況當然會較其他學童更為不利,所以一般我們在考慮這樣的問題時多著重在如何提昇這樣學生的華語程度、發展恰當之行爲模式及價值體系,協助其適應以台灣多數人文化為主流的學校情境。

然而,雖然這些學童的非台籍家長,多為自願移民,就一般而論,自願移民融入移民社會的意願強,多半都樂於積極學習主流社會語言,認同主流文化價值,甚至由於原屬族群在其所移入之社會中社會地位較為卑微,所以會有傾向於掩蓋、甚至否認自己原有之族裔背景的現象產生。可是在九零年代後,因為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相關多元文化研究已顯示其實這樣的向主流族群努力靠攏、認同的過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在學校、工作場中或許顯得適應得不錯(主流語言掌握得很好,也努力朝主流文化所推崇的模範榜樣努力),卻也是一個傷痕累累、不斷否認存在在自己身上的種族文化特質的一種自我否定的過程(Kottler,1997)。除了在同化過程的心理創傷外,本文則希望能藉由傅科系譜學性質之主體化觀點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同化歷程,不僅如多元文化心理學研究學者所指出的是一個傷痕累累的歷程,在政治權力上更是有著延續既有族群不平等權力結構的危險。

## 傅科系譜學性質的“主體”觀點與權力

研究傅科(M.Foucault)的學者學者認為:傅科思想原先是從一種結構主義性質的想法開始,可是其後則發展出對現代個體進行系譜學性質探討的轉向。可以說他思想從前期到後期呈現了相當程度之內在質變。雖然傅科自己自稱從來都不是個結構主義者,傅科的早期思考(也就是他自稱為“考古學”的研究)卻與廣義之結構主義有著混淆不清的曖昧關係。研究傅科的主要學者如梅奎爾(J.G. Merquior)(1985)、貝瑞 史馬特(Barry Smart)(1985)認為傅科在這個階段的思想是結構主義進路性質的,Dreyfus 及 Rabinow(1982)和前二人觀點不同,他們在二人合著之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一書中花了不少篇幅區分 atomistic structuralism、holistic structuralism 及 archaeology,然而不論是典型之結構主義或傅科之考古學,皆不認為人

是自由、自主的超然思考者，人都深陷於語言、言說中，思想受其限制。傅科在這個階段時，人在他看來似乎只是語言結構及這結構於其內在邏輯中進行自行演變的載具。而從知識的考古學到教化和懲罰，傅科呈現了思想上的轉變，他開始發展他所稱的“系譜學”式的探究，從原先單單對言說、語言的關注，逐漸擴及對制度、社會實踐、權力技術和知識型式的關連的考量，並呈現出他關切的終極議題是自我和上述這些事的複雜關係，此即其命名為“系譜學”式的探索。

在這樣的轉變中，傅科的思想焦點開始逐漸明白呈現為“在社會中的人”，而且傅科不同意西方對問題進行抽象性、概念性探究的傳統做法，他對社會中的人的探究指的是對具體存在於歷史時間中的具體的人進行探究，他的方法是對實際領域進行歷史性的分析。他對真實活在社會、文化中的“如此這般的”、“具體”的人有興趣，並且開始討論這樣實際存在著的人與論述及其中的權力問題。他在為 Dreyfus 和 Rabinow 合著之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一書所寫の後記中表示，他一逕所關切的問題是主體(subject)，並明白指出他關切的就是“我們這樣的現代西方人是什麼？”這樣一個在一具體特定時代中作為“這樣”的人的問題。在這篇後記中他推崇康德追問 Was Heisst Aufklärung?，認為思索啓蒙後的西方人的特質是重要的問題，但少有哲學家問。他關切啓蒙後的西方人的特質(這是在嘗試理解在一個具體特定時代中如此這般存在著的人)，他嘗試著問:為什麼在此一具體特定時代中，人呈現如此這般的像貌?

他不認為在此一時代中人之所以呈現如此風貌可以用 the Repressive Hypothesis 來解釋，他在他的系譜學性質作品中對此提出他自己的答案。他認為:十八世紀後的歐洲人不是被強行壓制著、被迫順服，相對地，人是浸淫在這諸般作用在我們身上及認知上的“技術”中，也正是在實踐這些“技術”的當下，體現了這些實踐面背後所本的知識體系，並建構起自己的主體，成就自己為社會認可的“正常人”。

這樣的系譜學性質主體及主體建構和他所要說的“權力”從來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然而，要注意的是:傅科在此所謂的權力是不同於之前近代西方思想中的權力概念的。傅科在性史中說明了他的權力和與西方傳統的權力概念的不同(Foucault,1978)。他說他所要講的權力不是法律上所賦予一個人的權利，也不是強制壓迫在人身上的強權，例如違反個人意願將人強行押賣為奴的強權。他指出他所要說的權力與近代西方的權力觀念都不同，而與主體的自我建構有關。

在說明傅科的權力是什麼上，他對 subject 一字的解析可以說是說明他不同於近代西方權力觀點的關鍵，依據傅科的看法，subject 此字可以有雙層意義:其一為 subject to 的 subject，其意指因控制或依賴，而臣服於他人之下。另一義之 subject 則與自我意識、自我知識有關而與本身、本人之身份認同(identity)有關。他要說的權力正與後者息息相關，而非指前者，即非指某個階層或族群強壓於他人之上的權力(Foucault,1982)。他一再說明他的權力不是西方傳統對權力的想法，這些是和 subject to 有關的，這不是他要說的權力。傅科要說的權力是和自我意識、自我知識有關的也就是和 identity 有關的權力。傅科要說的是一種型塑主體、也就是形成個體的 identity 的權力，這樣的權力他說是一種“技術”，是一種使個體成為如此這般之“主體”的技術。

傅科用“技術”這樣的字眼或許讓人有些困擾，若以“性”為例，形塑一個人做為性主體的“技術”是像某些男性會接受入珠手術或像非洲某些地區對女性實施的女性閹割手術或中古歐洲為女性上貞操帶這樣的針對性而進行的某種特定而明顯的措施嗎？我認為他所謂之“技術”針對的不僅只限於對任何人而言都是顯而易見地是在針對著某種特定目的具特殊明確意義的具體措施而已。他所指向的範圍比這要大得多，他幾乎是將所有文化、社會制度面的存在都包含在他所考慮的“權力/技術”範圍內。而且，他所要說的“技術”是側重在動詞性的意義的。他要說的是在那最一般不過的每日生活實踐面的種種中，那雕塑、涵蘊人成為如此這般之具體個體的力量。這力量並不讓人覺得有外力附加其上、強迫他成為如何的個體或強迫他做什麼事，而是在最一般不過的每日生活實踐中，再自然不過的陶冶涵蘊作用。形成的則是如此這般的主體意識——我意識到(認為)自己是號怎樣的人物、讓我們辨視自己為、、、的“我”，這種做為技術的權力是直接實存於我們的每日生活中，無聲無息，卻是我呈現為如此之我的基本塑因。

## 教育與主體化

教育的過程都帶有傅科所說之主體化的作用——使一個人意識到(認為)自己是號怎樣的人物、讓我們辨視自己、建構自己、將自己內在化為、、、的“我”。而在不具批判意識的狀況下，在“自然而然”的狀態中所形成對自己如此這般的自我認知，往往會是外在社會對自身所處位階成員的既定形象。亦即在不具批判意識下的主體化過程往往成為將現有社會中對不同位階成員的既定形象內在化的過程，也因此合理化並複製了原有之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不具批判意識的教育提供的怎樣的一種主體化的環境與過程值得深思。就台灣目前的情況而論，當教育的過程，即使原為善意，想幫助東南亞籍配偶的子女適應台灣學校的特意設計，當內容強調的是加強中文能力以及形成“恰當”也就是合於主流文化的價值及行為模式時，即使教育過程並未對學生母親一方所帶有之文化顯示明白之鄙視，但是在整個大社會所瀰漫的風氣是：主流文化才是較高尚時，這樣單單強調漢文化內涵的教育過程不僅再次強調了主流語言與文化的重要，更可能會有強化了佔多數的漢人臺灣人的文化是較高尚的，東南亞的文化是較沒水準的種族文化歧視。在這樣情況下新移民的子女的主體建構結果將會是建構出一個自以為較主流者不如的主體，如此也會使個人趨向於接受自我族群既存不平等之社會地位，因而複製並合理化社會族群權力不平等之既定結構。

## 結論

台灣做為有一波新移民移入的社會，對這一波移民所會產生的新台灣之子，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有許多人在血統、文化上，都與目前台灣社會主流族群：華裔台人不完全相同。嫁做台灣媳婦的越南新娘有著她越南的文化、血統及她個人不可抹煞的越南成長歷史，這些都是她之為她的構成部分，這是不論她要不要，都是她的一個部分。而一個孩子有越南母親是一個不可更動的事實，如果我們所想的適應，是要他

學好中文，要他與主流華裔台灣人盡量無所差別，而他的母親的越南血統及文化卻不被彰顯，這就是要他否認存在在他身上的事實，這樣的融入主流與適應，是貶抑存在在自己身上的非主流血統及文化，是接受這個要否認的部分（非漢人系統的部分）是不被渴求的，是較低下的。這種適應會是臣服的適應。即使原為善意的協助適應設計並無此意，卻可能在學生的心理上形成如此之非預期的後果。

明顯強加於他人身上的直接奴役與壓迫是如此明顯之不公義與殘暴，受迫者也明確知道自己受到迫害，所以這反而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無知無覺的心靈自我矮化，看不到有形之手銬腳鍊，可是在心靈上卻已被綁成了小腳。對教育過程可能會形成怎樣的主體化作用不具批判省思能力的教育是危險的，這樣的教育不會是最非關權力、最非政治化的中立教育，相反地，這樣的教育反而最有可能支持、延續了既有權力結構。

協助新移民學童適應學校與學習需要具權力問題敏感度，筆者認為近年語言人權的研究中對語言人權揭櫫的兩個面向值得相關語言文化政策及教育政策思考，一為是否所有族群都有機會學好這個社會中之重要語言，另外一個面向是是否每個族群的原有語言都獲得尊重與保護。個人見解認為可以將對語言的尊重擴大到語言所屬之文化的尊重。協助這些學生學好華文，了解這個社會的主流文化當然必要，這是新移民生存基本所需。除此之外，若亦能制定相關政策同時尊重外籍配偶（多為女性）原有語言、文化，並協助其傳承予其子女，則不必重覆在歐美地區移民在努力融入於主流文化中所經歷的痛苦。同時也讓台灣主流的家長及子女學習欣賞、思索不同的文化，這是用行動表示我們對多元文化、多元族裔的尊重，讓所有新一代的台灣人可以以自身身上有著多種文化的豐富傳承為傲。如果我們能以美國的移民經驗為借鏡，我們當有遠見，早做妥善之政策規劃，避免這群新台灣之子受到同樣的心理傷害，並減低既有族群權力不平等結構的複製。事實上，新移民的移入代表新文化元素的移入，如果我們能有效地將新移民移入的事實轉為助力，“台灣”這個符號的文化內涵將更為豐富，台灣文化將可有更高之原創性與生命力。

## 參考資料

- Dreyfus, H. & Rabinow, P. (1982).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Dreyfus, H. & Rabinow, P's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Kottler, J. A. (1997). *What's really said in the teachers' lounge—Provocative ideas about cultures and classrooms*. CA: Corwin Press, Inc.
- Merquior, J. G. (1985). *Foucaul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Smart, B. (1985).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